

• 专题研究 •

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日〕柿 沼 阳 平

〔关键词〕三国；蜀汉；货币；经济；布帛；钱币；黄金；物流；军事最优先型经济

〔摘 要〕蜀汉政权自始至终坚持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其基础是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分别同时管理以尚书系为核心的朝廷和以将军系为主的军队，该体系在尚书令陈祗死后开始发生动摇。所谓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是指拥有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吏卒的蜀汉，对这些吏卒加以合理利用，以计划性军事都市汉中为据点开展远征、绑架、屯田三位一体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是实现增强兵力、镇抚周边、显扬国威的以军事为最优先的经济体系。其中，布帛起到主要国家性结算手段的作用，钱则是民间经济流通的手段，两者分别作为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的润滑油进行流通。由于蜀汉吏卒的人口性比率与优先军事型政策在其他战时国家中最为突出，所以与其将蜀汉经济称做“战时经济”或“军事经济”，不如称其为“军事最优先型经济”。另外，虽然蜀汉政府对民间经济的发展较为轻视，但其经济却没有呈现出失调、矛盾的现象，这也是蜀汉经济的结构性的特点。

一 前 言

笔者曾经对曹魏的货币经济进行了探讨^①，其结论为，在曹魏，虽然五铢钱自东汉以降失去了国家性结算手段的功能，但作为纯粹民间的经济流通手段却得以重获新生；另一方面，布帛作为新的国家性结算手段开始发挥作用。这一货币史上的重大转变起初仅发生于曹魏国内，后来由于接连发生了曹魏吞并蜀汉、曹魏禅让帝位于西晋、西晋吞并孙吴等历史事件，从而导致其成为自三国时代以降货币经济总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在这一中原货币经济的转折时期，曹魏以外的两大国（蜀汉和孙吴）中究竟存在何种经济体系呢？相较于建立了中原主流经济的曹魏和西晋而言，蜀汉、孙吴仅作为地方政权割据四川、江南数十年，在这个意义上蜀汉和孙吴的经济只不过是一种“亡国经济”。然而如后所述，实际上，生活于“亡国”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反复进行探索，试图在三国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结果成功地孕育出独特的地方经济。在描述魏晋南北朝货币经济的时代特点时，不能无视地方政权的挣扎和他们思索经济的过程。

那么蜀汉经济具体有何种结构性特点呢？过去认为蜀汉经济的相关史料非常少^②，但也未

必完全没有，如陶元珍、陈啸江、余鹏飞等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已对此做了细致的史料收集和考证^③。关于蜀汉的主要经济政策及丞相诸葛亮的经济思想等也有很多论考，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对蜀汉经济的结构性的特点进行总体的、系统的论述。如笔者在后文所述，可以认为蜀汉是“军事最优先型国家”，亦即，蜀汉拥有占其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吏卒（参见后文表 1），这个比率在中国古代诸国家中最高，可见蜀汉比典型的军事国家更为严格（以下称“军事最优先型国家”），但以往学者几乎很少探究蜀汉是如何在经济方面支撑其军事这一问题。例如，闵传超主张蜀汉只重视

* 本文是 2011 年度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助成（研究课题：中国南北朝时代における貨幣經濟史の研究）的研究成果。

①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2011 年版。在引用日本研究刊物或论文时，如果著者、论文名称、刊物名称的中文译名与日文原名一样，省略中文译。

② 〔日〕村田哲也：《蜀汉政权成立前史——成立期刘备集团的支配をめぐる》（蜀汉政权成立前史——围绕成立时期刘备集团的支配），京都《东洋史苑》第 74 号，2010 年。

③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陈啸江：《三国经济史》，台北，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 1936 年版。余鹏飞：《三国经济发展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军事而忽略了经济发展^①；周一良则主张蜀汉经济，尤其在诸葛亮执政以后发生了倒退^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张诸葛亮出于军事目的维持经济，且一味地依赖四川地区的丰富的资源，从而未着手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没有推出特别值得称道的经济思想和政策^③。这些研究均对于蜀汉货币经济的存在做出了消极评价。另一方面，刘静夫则认为蜀汉立足于丰富资源，其立国的基础是小农经济^④。关于诸葛亮独有的经济思想，余鹏飞列举了农本主义政策、盐铁和绢织物的生产、减免徭役和赋税、力行节约和反对奢侈这四点^⑤。但这些也仅限于对相关史料的介绍及概说，既未论及经济与军事之间的联动，也没有全面地描述蜀汉经济的结构特点。此外，高凯、郑发展、赵中祥认为由于蜀汉对军事过于重视，造成人口失调，所以其灭亡是必然的结果^⑥。陈玉屏主张虽然蜀汉有强大的兵力，但同时也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叛乱，乃是因为诸葛亮的道德精神对老百姓具有深刻影响的缘故^⑦。虽然这些研究把蜀汉定位为军事国家是准确的，但其主题均非对蜀汉经济的分析，没触及到经济问题的核心。另一方面，周红指出蜀汉开展的几次远征给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性负担^⑧。王明前也指出诸葛亮执政的蜀汉其基础是“军政合一”或“以军统政”的“战时经济”^⑨。这两个研究准确地关注到经济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并对其内容做了讨论，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遗憾的是，周红与王明前的研究都未深入，再加上材料不足，解释也不十分严谨，因此在很多问题点上笔者认为尚存值得商榷之处。众所周知，关于蜀汉的史料不少都缺乏可靠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基于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审慎的考察。另外，周红与王明前把蜀汉经济看做战时经济，但他们却未对蜀汉经济与其他中国古代的战时经济的区别进行说明。如上所述，蜀汉吏卒比率在中国古代诸国中为最高，基于这一点，蜀汉经济与诸国也应具有某些不同的特质。蜀汉政府虽然是非常严格的军事最优先型国家，有四十多年的命脉，但如后文所述，蜀汉灭亡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国内存在经济上的问题，而是受到曹魏进攻的缘故。因此，蜀汉灭亡的直接原因不在于蜀汉内部（比如军事最优先这一倾向、人口失调等）。我们与其在蜀汉的

灭亡的前提下试图寻求蜀汉经济上的缺陷，不如通过对可靠资料的统计了解蜀汉经济的构造性特质。在本稿中，笔者试以蜀汉军事和经济的关系为中心阐明其经济的结构特点，并以此揭示蜀汉经济与中原主流经济（东汉经济→曹魏经济→西晋经济）的区别。

二 刘备集团和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1. 入蜀期

如前所述，在讨论蜀汉经济的结构特点时，最需要关注的是其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关系。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原本是军人，他在东汉末年的战乱时期在河北起兵，其股肱之臣关羽、张飞等也是地道的军人。他们作为佣兵军团转战各地，名声逐步得以提升。其后，刘备通过“三顾之礼”迎来诸葛亮，又经赤壁之战得到荆州的局部，此后打出击败曹操、汉室再兴的大义名分，继续加强军团的建设。可见，刘备政权从来都对军事十分重视，而经济则从来都是作为军事的附庸存在的。例如赤壁之战后，刘备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纳入囊中，交由诸葛亮管理，诸葛亮则将该地的赋税用于“军实（军费）”。

A. 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邳。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

- ① 阎传超：《诸葛亮再评价》，《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4期。
- ② 周一良：《论诸葛亮》，《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三国时期其他人物的经济思想》，《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
- ④ 刘静夫：《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⑤ 余鹏飞：《三国经济发展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⑥ 高凯、郑发展、赵中祥：《从人口性比率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 ⑦ 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 ⑧ 周红：《论蜀汉兴衰的财政原因》，《现代财经》2000年第11期。周红认为蜀汉的主要政策是“以攻为守”，这看法是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来的。但张大可（《论诸葛亮出师》，《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李兴斌（《诸葛亮北伐曹魏目的论析》，《门外谈兵》，齐鲁书社2004年版）等批评这一观点。
- ⑨ 王明前：《蜀汉政权的军政体制与战时经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11年第3期。

其赋税,以充军实^①。

当然刘备在运作政权时不可能将全部赋税都用于军费,一部分也会用来完善其统治地区的基础设施等。但史料中仍明确记载赋税用于军费。

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统一天下之策^②。他建议刘备政权要先取交通要冲荆州和经济资源丰富的要害之地益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在此基础上“内修政理”,乘天下有变,自荆州、益州出兵打倒曹魏。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出于重视军队建设的目的,而是主张应在“内修政理”(以下称“重视内政的体系”)的基础上伺机出兵。这并不能表示诸葛亮对内政体系持轻视的态度。他只是主张应该先重视以军事为最优先的经济体系(以下称“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此后重新重视内政,并非完全忽视内政体系。

入蜀前的刘备还只是占有荆州的局部地区,所以首先必须建立为保持势力所需的军队。这也使得刘备不得不在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下优先加强军备和扩张领土。这亦是史料 A 中所述的将赋税主要用于军费的理由之一。即,相对于“复兴民间经济”而言,刘备更加重视“复兴汉室”所需的军备。这一点也如实地体现了刘备与诸葛亮“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政治取向^③。田余庆认为赤壁之战以后刘备政权的动向轨迹很符合“隆中对”的计划,但他同时又提出,由于诸葛亮当时尚未处于政府的中枢地位,基于“隆中对”的政权运营实际上始于刘备死后^④。不管怎样,刘备一直重视军事这一方针跟“隆中对”的理念基本吻合。

其后,刘备将军队推至蜀地。当时的四川是极其丰饶的农业地带,因此,这一地区奢侈之风十分盛行^⑤,当地的刘璋政权便拥有着巨额财富。

B. 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⑥。

C.【建安】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⑦。

D.【先主入蜀时】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⑧。

据上引史料可知,原本无辎重的刘备军通过入蜀战争取得了巨额财富^⑨。到了成都入城时,其除了分别向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赐黄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外,还赐予其他军

官、士兵以金银等物。

E. 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以飞领巴西太守^⑩。

F.【建安】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⑪。

史料 F 中记载刘备入蜀后向将士们发放“金银”,似乎刘备发放之物仅限于金银。但在史料 F 后段记载又有“还其谷帛”,史料 K(见后文)中也记载了发放“府库百物”。因此可以据此推测出实际发放之物除了“金银”外还涉及到其他各类财物。可以看出,刘备虽然尚未具有足以与曹魏抗衡的领土,需要极力缩减财政开支,但是却不吝于向长年追随的将士发放财物。这从侧面表明,原本该用于政权运作及完善国内基础设施

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915~916 页。以下引用《三国志》时只举传名。

② 《诸葛亮传》,第 912~913 页。如内藤湖南所说,《隆中对》的目标不是“天下三分”而是统一天下(〔日〕内藤湖南:《诸葛武侯》,《内藤湖南全集》第 1 卷,东京,筑摩书房 1970 年版)。

③ 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后主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09 页。这是诸葛亮对滥发大赦做的劝告,由此可见诸葛亮与刘备的政治态度。

④ 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秦汉魏晋史(重订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⑤ 《董和传》曰:“益州牧刘璋以【董和】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然县界豪疆悍和严法,说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第 979 页)

⑥ 《刘二牧传》注引《吴书》,第 869 页。

⑦ 《刘二牧传》,第 869 页。

⑧ 《先主传》,第 881 页。

⑨ 《法正传》曰:“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第 958 页)

⑩ 《张飞传》,第 943 页。

⑪ 《先主传》,第 882 页。关于“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这句,《通鉴》跟《蜀书》一样,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后主志》作“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第 367 页)。不过《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献帝建安十九年条胡三省注曰:“公私所有金银。”(第 2129 页)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也把“民金银”一句解释为公私的财物表示对胡注的肯定(第 368~369 页)。即,任乃强认为其中的“民”是指刘璋、臣下、富商、巨室等,不包括官库和一般民家。但笔者认为没收刘璋财物的人是刘备,不是一般的士兵,且以后刘备把它又还给刘璋了,所以两者完全不一样。笔者认为刘备允许士兵掠夺的对象应不包括富家、一般民家而只是官库。即《华阳国志·刘先主志》的说法有误。

的资产被优先使用于军功的褒赏方面。也就是说,相较于民生而言,此时的刘备优先考虑的是军人。

其结果自然是令国库瞬间告罄。于是如史料 F 所述,刘备又令将士们将谷物和绢织物退还国库,理由可能是因为谷物和绢织物是政权运作所必须之物。事实上,从传世文献中散见的事例可知,谷物和绢织物在之后的蜀汉是作为主要的国家性结算手段存在的。

G. 亮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邓】芝答曰:“【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云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有为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①。

H.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②。

I. 【建兴】二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③。

可见,由于绢织物和谷物在刘备入蜀后是国家运作的必需品,因此刘备禁止将其悉数进行发放,而要求将士将其退还国库。那么难道谷物和绢织物以外的财物就不是政权运作所必须之物吗?从下面史料可见,炎兴元年(263年)蜀灭亡时国库中仍有少量的黄金等储备。

J. 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④。

相比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王莽时有七十万斤)而言,蜀汉的金银拥有量(金银各两千斤)实在是微不足道。这个量大致等于入蜀时赐予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的黄金总量,因此,其作为一国的拥有量来说着实少得可怜。可见黄金应该只是一种单纯的贵重品,而不是政权运作所必须的结算手段^⑤。

另一方面,钱又是怎样的呢?据上文的分析,刘备在入蜀时很可能将除了谷物、绢织物以外的财物全部发放给将士,而且,实际上,以下史料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件事。

K. 初攻刘璋,【刘】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

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⑥。

其原因之一应该是由刘备此时依然是汉臣,汉代军功褒赏制以钱为主^⑦,因此在军功褒赏时必须发放钱。但他为什么没有像收回谷物、布帛那样对钱进行回收呢。如果刘备认为钱是其后政权运作中所必须,就不会在发放钱后不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很有可能刘备根本没打算在入蜀后的政权中将钱作为主要的国家性结算手段(例如维持政权所必须的发给将士及吏的薪资等)。事实上,也找不到此后蜀汉大规模使用钱作为国家性结算手段的史料。

2. 刘巴的名义货币政策

入蜀时众多大臣、将士都收到了钱作为褒赏,对于他们来说,钱还是具有某种价值的。从前揭史料 K 可知,对于因入蜀时发放“府库百物”而陷入财政困难的刘备,刘巴建议铸造一种“直百钱(一枚相当于百钱)”的名义货币与以往的五铢钱同时并行流通,以便从民间购买诸项物资。同时他还建议首先制定官市掌控交易现场,令吏对商人进行监视,使他们无法拒绝使用名义货币或在五铢钱和名义货币之间进行选钱以平诸物价,进而从民手中收购“百物”充实府库。这个前提是在蜀汉的集市中仍然广泛流通着作为“直百钱”基准的五铢钱。事实上,蜀汉古钱中确有“直百五铢”、“五铢”等钱文,据传入蜀时铸造的是“直百五铢”钱^⑧,可解释为“值百钱的五铢钱”。可见蜀钱作为民间的经济流通手段应仍然具有价值。当然,既然此时蜀汉政府用钱从民间

①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第 950 页。

② 《诸葛亮传》,第 927 页。

③ 《后主传》,第 894 页。

④ 《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第 901 页。

⑤ 据《后汉书·郡国志五》建为属国条注曰:“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516 页)诸葛亮通过南征获取了金银,但如本稿所述,蜀汉政府的黄金储备量比不上汉代。

⑥ 《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第 982 页。

⑦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第 6 章。

⑧ 总论编写组:《总论》,马飞海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 2·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王怡辰:《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台北,文津出版社 2007 年版。总论编写组认为“直百”、“太平百钱”、“世平百钱”、“太平百金”、“定平一百”、“直百钱”、“直一钱”均为蜀汉的钱,但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认为关于“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尚存疑问。

收购物资,钱作为国家性结算手段也被排除出去。然而如前所述,很难断定蜀钱经常被用于支付包括将士的薪资等普通经费,这一点上蜀钱与汉钱之间存在很大区别。蜀汉政府为了从民间收购财物,临时增铸了已经被民间广泛接受的钱,而蜀汉政权运作所需的基本国家性结算手段仍然是布帛和谷物。而且刘巴政策的前提是由政权对“官市”中的商品交易和钱本身的信用进行担保,反之,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国家统制将会引发钱的贬值和物价高涨。如果“直百钱”在“官市”以外的集市流通则很容易使得钱发生贬值。就算规定布帛和钱的固定比价以试图暂时维持名义货币的价值也非易事。事实上,汉帝国也曾试图使钱文偏离实际重量,但均以失败告终^①。也就是说,刘巴政策的首要目的仍然在于回收军需物资,其优先考虑的未必是稳定民间经济。顺便提一下,此时国库应该已经出现钱的短缺,短期内也难以收集铜等原料。根据以下史料,为了渡过这一难关,刘备可能通过熔化“帐”中的铜配件等来铸钱。

L. 上即位,〔崔〕祖思启陈政事曰:“……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②

蜀汉虽然实施了上述军事最优先型政策,但并没有因此引发大的经济混乱^③,原因之一应该是当时多数有钱人是军人,是那些入蜀时的军功受益阶层,而他们必须听命于政权的缘故。而且那些因军功而受益的阶层在入蜀时受到购置土地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成为地主^④,而不得不依靠政府。即便是首要的重臣诸葛亮也尽量回避蓄财(史料 H),这无疑有助于约束其他大臣成为地主^⑤。但同时也促使非益州系大臣(来自别州的大臣,以下称“非益州系大臣”)支持政权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原来的益州豪族(以下称“益州系大臣”)的领地得以保全,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似乎比非益州系大臣更受优待^⑥。而且,益州系大臣并非是因入蜀战争的军功褒赏得到钱从而兴起的势力,他们以原来的大土地所有作为其主要财源,所以刘巴的货币政策应该并未使他们受到足以丧失全部财产的沉重打击。这样一来,刘巴的政策巧妙地回避了益州系大臣和非益州系大臣双方的不满,从而得以顺利实施。那么,蜀汉后来又是如何驾驭经济的呢?

三 汉中争夺战和南征的经济意义

刘备在入蜀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进军汉

中。此时的汉中已落入曹操手中,刘备经过斩曹操麾下勇将夏侯渊而成功夺取。由于此时汉中大部分百姓已被移居北方,所以刘备实际得到的是一座较为空虚的汉中^⑦。但,因为这是刘备首次直接对峙曹操而大胜,夺取汉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秋被推

①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第 3 章。

② 《南齐书·崔祖思列传》,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518 页。

③ 关于曹操镇压汉中,《刘晔传》注引《傅子》曰:“【曹公】居【汉中】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第 445~446 页)这只不过表示因为曹操镇压汉中,蜀汉陷入了暂时的混乱。实际上,谋臣刘晔曾劝告曹操,从今起对蜀汉发动进攻也来不及了。因为其推测取得蜀汉的消息需要几天,再加上攻击蜀汉的准备工作仍需要几天,而到那时候蜀汉的内情已经得以恢复。

④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曰:“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有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第 950 页)

⑤ 《姜维传》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衰,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第 1068 页)这意味着姜维刻意避免私利和积蓄钱财的态度。

⑥ 关于益州系大臣和非益州系大臣的区别,参见〔日〕狩野直禎:《蜀汉国前史》,东京《东方学》1958 年第 16 辑等。该讨论目前进展到关于大臣的出身分类的问题。〔日〕渡边义浩:《三国政權の構造と「名士」》(三国政權の構造和“名士”),东京,汲古书院 2004 年版;〔日〕上谷浩一:《蜀汉政权论——近年的诸说をめぐって——(蜀汉政权论——围绕近年的诸种见解)》,东京《东方学》1996 年第 91 辑等都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但在本稿不做讨论。顺便要说的是,关于抵抗刘备入蜀的人,渡边认为是自刘焉以来的东州兵与“在益州本地不具势力的人群”,而益州本地势力属于刘备。上谷对渡边的见解做了批判并认为反抗刘备的人们之中还有黄权、严颜、郑度等益州本地势力。〔日〕狩野直禎:《蜀汉政權の構造(蜀汉政權の構造)》(京都《史林》1959 年第 42 卷第 4 号)认为,巴蜀豪族基于“保身”行动,但严颜与张任被抓住喊一声:“杀我。”(《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第 883 页;《张飞传》,第 943 页)他们的行动原理不一定是基于“保身”的。而且各人有相异的个性和背景,按出生地来分为“名士”,渡边这样的研究方式有探讨的余地。

⑦ 《周群传》曰:“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问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臻慎之。’时州后部司马蜀郡张裕亦晓占候,而天才过群,谏先主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第 1020 页)

举为大司马和汉中王,且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即皇帝位。由于蜀汉在此不久前刚失去荆州,且刘备在即位皇帝后的夷陵之战中大败于孙吴,所以没有理由放弃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在刘备死后南蛮也相继发生叛乱,那么,诸葛亮是如何在新皇帝刘禅面前处理经济事务的呢?

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后,首先尝试远征南蛮。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刘备死后发生了益州豪族雍闿的叛乱,另外,建兴元年(223年)也爆发了牂牁太守朱褒、越嶲蛮王高定的叛乱。此外,南征背后还有下述经济方面的考虑。蜀汉原本设有盐府校尉(王连^①)、司盐校尉(岑述^②)、司金中郎将(张裔^③),并通过这些机构管理蜀汉的特产品盐铁以补充军费^④。当时盐府校尉王连特意请来吕乂、杜祺、刘干等任典曹都尉,典曹都尉很可能也参与了盐铁的业务。然而,如同汉代盐专卖制造成为民众的负担一样^⑤,国家对盐铁的管理也可能给蜀汉的民间经济带来弊害。事实上,王连的工作虽然一方面因“军资所恃,是辨是裨”^⑥而受到肯定,另一方面也受到“苟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⑦的批判。另外,在蜀汉,绢织物也在“锦官”^⑧的管理之下售往曹魏及孙吴,实现了高额贸易盈利^⑨。诸葛亮认为绢织物是“决敌之资”^⑩,非常重视其在经济战争中的意义。而且对上述史料进行仔细研读可以发现,盐铁及绢织物作为蜀汉的军需工业受到相当的重视,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民间经济。蜀汉从一开始就有丰富的物资,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地方政权的稳定,诸葛亮没有必要亲自远征南蛮。可是正如前揭“隆中对”可知,为了讨伐曹魏必须确保更多领土、物资及平定南蛮,这就是诸葛亮必须大举南征的原因。

但王连对此屡次提出反对,因此,一开始诸葛亮并没有亲赴南征。在王连看来,只要能牢牢掌控盐铁政策就没有开拓新的财源的必要,虽说南蛮发生了叛乱,但就其重要性而言,也不足以令诸葛亮冒着患风土病等危险亲赴前线镇压。但建兴二年(224年)王连死后,第二年就开始了南征。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刘备的服丧期已过,另一方面,王连这一才华出众的官僚的去世导致益州的盐铁进行得并不顺利,因此向南蛮开拓创造新的财源也就转为必要了。这样一来,诸葛亮没有在建兴元年(223年)立即进行南征,而是作了两年的准备的原因以及王连相关史料就都能

解释得通。诚如以往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南蛮是盐、铁、耕牛、军马、金、银、犀皮等物资的宝库,蜀汉令南蛮人献上诸项物资用来做北伐的准备,这无疑减弱了益州在北伐时受到的经济性压力,因此使得益州系大臣变得不再那么反对北伐^⑪。

结果,蜀汉从南蛮人手中夺取这些物资的原

① 《王连传》曰:“王连……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建兴元年,拜屯骑校尉,领丞相长史,封平阳亭侯。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连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第1009~1010页)

② 《杨洪传》,第1014页。

③ 《张裔传》曰:“先主以【张】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第1011页)

④ 《吕乂传》曰:“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吕】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第988页)《太平御览·饮食部·盐》所引《博物志》曰:“临邛火井,诸葛亮往视之后,火益盛。以盆贮水煮之则盐。后人以火投井中火即灭,至今不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40页)且《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下陵州·始建县条》曰:“铁山,在县东南七十里。出铁,诸葛亮取为武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3页)说明也有诸葛亮直接采铁制造兵器的情况。

⑤ 〔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第8章。

⑥ 《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曰:“屯骑主旧……军资所恃,是辨是裨。赞王文仪。”(第1082页)

⑦ 《廖立传》曰:“【廖】立计曰:‘军当远立,卿诸人好谗其事……今弱世也……王连流俗,苟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第997页)

⑧ 《初学记·宝器部·锦》引《益州记》曰:“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中华书局1962年,第655页)“锦官”是“锦官”之误。仲山八郎《唐末までの蜀锦生产(唐末以前の蜀锦生产)》(东京《一桥论丛》1954年第32卷第4号)收集了蜀汉绢织物的相关史料。

⑨ 《太平御览·布帛部·锦》曰:“魏文帝诏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金薄蜀锦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环氏《吴纪》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太平御览·布帛部·锦》曰:“《丹阳记》曰:‘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第3622、3624页);《吕蒙传》说吕蒙在奇袭关羽时为了士兵作商贾人服。根据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三国时代国家间有一定的商业交流,其中蜀汉以高价出售布帛。

⑩ 《太平御览·布帛部·锦》曰:“《诸葛亮集》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第3624页)

⑪ 〔日〕渡边义浩:《三国政权的构造と“名士”》(三国政权的构造和“名士”),第165~194页。

产地,并对他们课以赋税和兵役^①。另外,由于贵重品等通过西南丝绸之路流入南蛮,因此蜀汉可能将这些物资也纳入其管理之下^②。

在压制南蛮后,蜀汉经济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呢?诸葛亮在南征后至北伐前给君主刘禅的所谓《出师表》中提到取得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但同时也表示“益州疲弊”^③。乍一看两者似乎相互矛盾,其他史料中也散见蜀汉当时拥有大量的军需物资和关于益州疲弊的记载^④。《出师表》应该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南征的成果仅仅在于取得了充足的军需物资,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蜀汉经济的全面提升。南征虽然确如以往学者指出的那样,其目的之一在于对南蛮实行经济上的剥削^⑤,但严格来讲,其对象是军需物资,丰富民间经济并非主要的目的。当然,蜀兵及其家庭中也存在不少南征的军功受益者,可是他们没有与民间经济直接相关而是作为官方人士受益。可见,对诸葛亮而言,仍然是军事优先于内政,所以在《出师表》中同时存在阐述民间经济疲弊的“益州疲弊”和“获得军需物资”的内容。

四 北伐的经济背景

1. 蜀汉的人口比率和军事最优型经济体系

诸葛亮在从南征回师后的翌年起开始实施北伐。按照前揭《隆中对》,原本北伐计划的前提是占领荆州。但此时的荆州并不属于蜀汉,因此无法过渡到重视内政的政策。曹魏和蜀汉之间存在的国力上的差距已经难以弥补,如果仅仅是端坐国内实施重视内政的政策,其后果只会使两国间国力的差距逐步加大^⑥。基于此诸葛亮才决定,即使“益州疲弊”,仍坚持优先确保军需物资,维持军事最优型经济体系,断然实施北伐。

表 1 魏晋时期人口统计

国名	地方	年号	公元	兵数	吏数	户数	口数	出典等
蜀汉	蜀汉	刘备章武元年	221	不明	不明	200 000	900 000	《晋书·地理志》等。
		刘禅建兴五年	227	200 000 以上	不明	不明	不明	《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等。
		刘禅炎兴元年	263	102 000	40 000	280 000	940 000	《后主传》注引《蜀书》等。
曹魏	曹魏	曹奂景元四年	263	不明	不明	663 423	4 432 881	《通典·食货七》等。

国名	地方	年号	公元	兵数	吏数	户数	口数	出典等
孙吴	孙吴	孙权赤乌五年	242	不明	不明	523 000	2 400 000	《晋书·地理志上》等。《通典·食货七》以户数为 52 万、口数为 23 万。
		孙皓天纪四年	280	230 000	32 000	523 000	2 300 000	《晋阳秋》等。《通典·食货七》以户数为 53 万。
西晋	旧曹魏及旧蜀汉之地	武帝太康元年	280	不明	不明	2 459 840	16 163 863	《晋书·地理志》。《通志·食货略》与《文献通考·户口一》以户数为 2 459 804。
	益州			不明	不明	149 300	597 200	口数按 1 户 4 口这比率来计算。
	秦州(阴平与武都而已)			不明	不明	6000	24 000	口数按 1 户 4 口这比率来计算。
	宁州			不明	不明	82 400	329 600	口数按 1 户 4 口这比率来计算。
	梁州			不明	不明	80 800	323 200	口数按 1 户 4 口这比率来计算。
	前四州的合计(旧蜀汉)			不明	不明	318 500	1 274 000	口数按 1 户 4 口这比率来计算。

① 方国瑜:《南中地方势力与蜀统治之争夺及相互利用》,《方国瑜文集》第 1 辑,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黎虎:《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等。

② 〔日〕宫川尚志:《诸葛亮孔明》,东京,富山房 1940 年版;〔日〕宫崎市定:《アジア史概说(亚洲史概说)》,《宫崎市定全集》第 18 卷,岩波书店 1993 年版。

③ 《诸葛亮传》:“【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第 919 页)

④ 《李恢传》曰:“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第 1046 页);《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曰:“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荣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第 917 页);《谯周传》曰:“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瘵,【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第 1029 页)《旧唐书·张柬之传》曰:“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939 页)

⑤ 方国瑜:《南中地方势力与蜀统治之争夺及相互利用》;黎虎:《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等。

⑥ 《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所载的《后出师表》曰:“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第 923 页)梁玉文等《诸葛亮文译注》(巴蜀书社 1988 年版)把《后出师表》认为是伪作,但《后出师表》确实是魏晋时期的作品,所以它能够反映当时的实情。

那么蜀汉的兵力如何呢?从表1可知,其兵员总数为十至二十万人。根据史料C、D,入蜀时刘备军为三万人,刘璋军在成都有三万人(另在雒城有一万人^①),而刘璋投降时无损伤的成都军三万人被合并入刘备军中。所以在入成都后,刘备军已近七万(不含关羽的荆州军^②)。而且刘备在与曹操进行的汉中争夺战中进一步实行增兵^③。虽然后来蜀汉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但如前所述,蜀汉通过南征再次得以增强其兵力,且应该不会大规模的裁减兵力。表1的二十万可能略有夸张,但北伐时的士兵人数应该比蜀汉灭亡时多,估算有十万以上当是稳妥的。

关于蜀汉的总人口,从多种史料来看(表1),估计其为一百万人左右应该不会有大的谬误。事实上,太康元年(280年)蜀汉旧地的人口也与蜀汉灭亡时的人口相似,两者之间相差并不大。就蜀汉的总人口,高敏认为蜀汉的吏、卒、民三者存在人口比率上的失调,《晋书·地理志上》曰:“(章武元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④《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曰:“(炎兴元年)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见蜀汉总人口在大约四十年间并没有太大变化,造成这样的结果或许是由于《蜀记》记载有误,也有可能是蜀汉政府对其真正的总人口进行了隐瞒,蜀汉绝对不太可能拥有十万兵及四万吏^⑤。不过,如高凯、郑发展、赵中祥所述,由于蜀汉连年远征,所以其人口应该没有得到增长^⑥。且《蜀记》是蜀汉灭亡时向曹魏奉献的,所以没有必要对其进行隐瞒。余鹏飞、蒋福亚指出,在巴蜀存在有地主经济,上述人口统计是地主向中央政府申报的数字,实际上应该还有众多民众在地主的管理之下^⑦。但不管怎样,蜀汉政权也掌握有一百万人口、十万兵以及四万吏,其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基于这些数字而对收支进行核对。这意味着每约六七人中就有一人是吏、卒。这一比率按现代中国来说相当于有一亿五千万以上的吏、卒,显然不正常。

与汉代的人口统计相比较,蜀汉兵员总数多这一异常现象更加明显。渡边信一郎认为,西汉武帝时期的总人口为约五千万,包括约十二至十三万官吏与一百五十万徭役劳力,另有负责地方郡国的军役、吏役的甲卒(正)数十万,还有负责边境、中央诸官府警卫的戍卒数十万,合计在平时有七十万至八十万。因此,渡边认为汉代拥

有非常庞大的劳动人口群^⑧。按照这一比率,蜀汉约百万人口,则最多只能动员约三万的徭役劳力和约一万五千人的士兵。因此,上述人口比率中蜀兵达十万人这一现象无疑不正常^⑨。

那么,上述人口比率真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了吗?蜀汉以外国家的人口比率情况又如何呢?虽然曹魏的比率尚不明确,但从曹魏灭亡后不久的西晋泰始六年(270年)正月的《河南南乡太守郭休碑》中,可以发现存在军队过多的倾向。

M. 郡领县八,户万七千百卅。职散吏三百廿。兵三千人。骑三百匹。参战二人。骑督一人。部

① 《法正传》曰:“及军围雒城,【法】正笈与【刘】璋曰:‘……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陈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第958页)

② 〔日〕村田哲也:《蜀汉政权成立前史——成立期刘备集团的支配をめぐる》(《蜀汉政权成立前史——围绕成立时期刘备集团的支配》)认为荆州军很少。但关羽向北方越境入侵曹魏的樊城从而俘获了于禁的七军(《于禁传》,第524页),这意味着关羽至少有几万人。关羽在刘备入蜀以后对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加以继承,对军队进行了增强。

③ 《杨洪传》曰:“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杨】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第1013页)

④ 《晋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4页。

⑤ 高敏:《关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数字的几个疑问及试解》,《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357页。

⑥ 高凯、郑发展、赵中祥:《从人口性比率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

⑦ 余鹏飞:《三国经济发展探索》。蒋福亚:《由户口变动看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地主经济》,《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⑧ 〔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财政と国家(中国古代の财政和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131~163页。

⑨ “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第901页)越智重明认为此史料的“人”意味着“户”,所以蜀汉末年有户二十八万、兵户十万二千、吏户四万。但据越智所引的史料,我们尚不能断定“户=人”,参见氏著《魏晋南朝の政治と社会(魏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103~107页。的确兵户跟一般的户籍不一样,但不能便因此就认为“领户二十八万”不包括“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曲督八人。部曲将卅四人^①。

户17 130,如以1户4口计算相当于约七万人,相比之下兵为三千人,西晋、曹魏军人总数占比约为蜀汉的二分之一左右。这个史料中含有“骑督”和“部曲督”这些词,这表明他们的兵马应属于中央军,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应该给他们提供了一部分资金用来给养。但曹魏的兵数还是比两汉多。另外孙吴同样有军队过多的倾向(表1)。所以,如果以军队的比率异常之高为理由怀疑蜀汉的人口比率,那么曹魏和孙吴也有同样的问题。关于曹魏和孙吴的情况,滨口重国认为曹魏实行“兵户制(将士兵及其家人安排到一定地区,给予其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与编户民入不同籍,对户内男丁世代课以兵役义务的制度)”,而孙吴在皇帝即位以前实行“奉邑制(孙氏向主要将领给予奉邑,用收来的租赋给麾下军队提供给养的制度)”和“世兵制(由子弟继领父兄所用旧兵的制度)”,“奉邑制”在孙权即皇帝位后改为了“封爵制”。和曹魏、孙吴一样,蜀汉也实施兵农分离的兵制,除中央军外,令土豪适当拥有部众以维持治安。也就是说,曹魏、孙吴、蜀汉均实施了广义的“兵户制”^②。虽然这一说法在细节上尚存异议,但三国存在兵户制本身是无疑的。所以,曹魏和孙吴所谓异常多的兵力并非指实际在军中的人数,可以理解为只是户口统计中的预备兵户数。

但蜀汉在三国中的吏卒比率为最高,其实际在北伐等地派兵人数达六至八万^③,全盛期甚至可能动员了十万人以上。也就是说,蜀汉具有可随时派兵十万的经济基础。这表明,事实上,有十万以上的将、兵、吏的家庭依赖于蜀汉政府的俸给,并且暗示无法仅靠军队以外的纳税解决其经费。所以,笔者认为,蜀军本身肯定通过实施屯田等手段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外征时则只能对国外物资进行掠夺。

其实,重新审视诸葛亮的北伐行动,可以发现实际上其所有的军事行动均与经济情况有关。亦即诸葛亮北伐的整个过程均伴有确保粮食和屯田政策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发生在姜维断然实施北伐时,尤其是在延熙十九年(256年)的北伐中。原本姜维计划的前提是掠夺曹魏的小麦,但由于被对手将计就计加以利用反而招致大败。史念海认为南征和北伐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军粮^④,不过这应该是言过其实。因为诸葛亮的接

班人蒋琬、费祎并没有进行北伐,而在国内也没有因为军粮不足发生问题。相反,在蜀汉,由于其为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因此军队本身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通过在汉中等地的屯田、外征时在敌地实施屯田及略夺、对外国人的绑架,使其可以维持大军的开支。

2. 蜀汉的屯田政策和对外远征

在具体验证以上个人之见时,需要注意以下曹魏的邓艾对屯田政策的建议。

N. 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邓】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

①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9,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② 〔日〕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の研究(秦汉隋唐史的研究)》上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6~456页。

③ 曹爽在延熙七年(244年)越境入侵汉中时,蒋琬把蜀汉军主力移到涪,汉中只有三万人而已(《王平传》,第1050页)。据此,蜀汉主力一定超过三万人,延熙七年前,蜀汉主力跟汉中的三万人一起在汉中。假如蜀汉主力有五至七万人,则蜀汉至少能动员八至十万人。而且据《钟会传》,蜀汉灭亡时在乐城、汉城有五千人,姜维主力有“步骑四五万”,诸葛瞻还有军队,即蜀汉北面部队达到六万人以上。此外,关于蜀汉军队的规模,除了《三国志》以外还有别的史料。比如,《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曰“数万”(第935页),《诸葛亮传》注引《默记》曰“不满五万”(第935页)等。但它们并非簿籍本身。而且笔者推测《袁子》是曹魏的袁准《袁氏正论》,《默记》是孙吴的大鸿胪张俨的作品,亦即两者均不是蜀汉的史料。另外,《后汉书·郡国志一》注引《帝王世纪》曰:“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见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第338页)但如越智重明的《屯田》(《魏晋南北朝の政治と社会》)和余鹏飞的《三国经济发展探索》所述,这个史料中存在诸多问题。户籍相关史料本来属于绝密,既然史料之间有矛盾,笔者认为以蜀汉的相关户籍史料为依据似乎更为妥贴。

④ 史念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河山集》第1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①。

根据这个资料，在淮水沿岸，如果合计屯田五万士兵且随时有四万人进行劳动，由于当地具有优质的水资源和田地，所以预计可得三倍于“西”的收获，扣除诸项费用后每年得到的军粮为五百万斛。这样一来，六七年后即是三千万斛，这相当于十万士兵5年所用粮食的总量。这项政策虽然是以淮水沿岸的环境为前提的，但可以知道，在蜀汉，十万士兵5年的所需粮食为三千万斛等内容。这意味着在三国时期十万士兵每年需要六百万斛军粮，即士兵1人每年需要60斛、每月5斛、每天1.64斗^②。这个供应量超过了一个普通士兵的范畴（笔者推测其中也许还包括有用谷物计算的服装费）。事实上，据战国秦的《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第49~52简，即便是刑徒的隶臣也能够每月获得供应禾2石（每天0.66斗）^③，这样看来，为士兵每天供应的1.64斗并不算太多。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邓艾估计的“十万士兵每年需要六百万斛”。

那么，蜀汉是如何确保维持十万兵所需的每年达六百万斛的军粮的呢？如上面的史料中所示，邓艾估计，在淮水流域每年有四万人劳动则可得五百万斛，而“西”的收获最多只有其三分之一（约167万斛）。这虽然是曹魏国内的统计，但很难相信当时以肥沃闻名的汉中谷物产量会低于曹魏西方地区，所以如果在汉中每年屯田四万人，则最低应该也能收获167万斛以上。若蜀汉当时有十万士兵，其六成以上在汉中，男女都参加农耕作业^④，多数妇女是士兵的妻子，因此，简单计算，蜀汉应该每年有大约十二万男女屯田。而且，由于蜀汉不断地从其他郡向汉中补充士兵^⑤，并且令南蛮的人们迁移^⑥，再加上绑架北方和西方的异族及投降过来的人^⑦，所以实际上在汉中应该有近十五万名屯田人员。刘备入蜀时汉中本来就有十万户以上^⑧，后来由于他们被曹魏徙民至北方，因此广大的居住地、农地均为空地。那么，即使汉中的产量相当于“西”，一年内应该也能获得相当于167万斛的4倍，即六百万斛以上的军粮。这和维持十万士兵每年所需谷物储备量六百万斛相符。可以说，在蜀汉只要有一年左右的军粮准备期，其在第二年度便可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而且即便在远征期间，汉中也有士兵的家人进行屯田，且成都等地也不断地

增产粮食，这也为蜀汉军的粮食供应提供了保障。

而要完成上述屯田目标，当然需要有相关的屯田管理机构，尤其是汉中。在刘备进入时没有民，其都市建设需要刘备和诸葛亮从零开始进行，所以应该设置了某种管理机构。据《三国志·蜀书》中的记载，在汉中设有一种叫“督农”的官，由杨敏等人担任，负责管理汉中的男女以补充“军粮”^⑨。在传世文献中找不到吕乂之前就任“督农”者的名字，因此在此之前有可能由作为骠骑将军、中都护的李严（后叫李平）驻扎在汉中负责军粮的管理，实施同样的计划经济^⑩。这样一来，汉中因拥有大量的屯田而成为国外徙民的目的地，并迅速发展成能够驻扎十万士兵的计划性军事都市。

① 《邓艾传》，第775~776页。

② 张连科、管淑珍《诸葛亮集校注》曰：“军行，人将一斗干饭，不得持鸟育及幔，什光耀日，往就与会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④ 《蒋琬传》曰：“刘敏……与镇北大将军王平俱镇汉中。魏遣大将军曹爽袭蜀时，议者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第1060页）

⑤ 《吕乂传》曰：“【吕】乂迁新都，绵竹令，乃心隐恤，百姓称之，为一州诸城之首。迁巴西太守。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第988页）

⑥ 《张寔传》注引《益部耆旧传》曰：“后南夷刘胄又反，以马忠为督庠降讨胄，寔复属焉，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平南事讫，牂牁兴古獠种复反，忠令寔领诸营往讨，寔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第1052页）；《李严传》曰：“以曹真欲三道向汉川，亮命严将二万人赴汉中。”（第999页）

⑦ 《蒋琬传》，第1060页。《张寔传》曰：“【延熙】十四年，武都氏王苻健请降，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大将军蒋琬深以为念。寔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独健来从。’”（第1051页）

⑧ 《张鲁传》曰：“群下欲尊【张】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第264页）

⑨ 《吕乂传》曰：“吕乂……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第988页）《蒋琬传》，第1060页。

⑩ 《诸葛亮传》注所引张俨《默记》曰：“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赞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第935页）

根据以上分析,假设蜀汉在进行大规模远征时最低需要一年的军粮准备期,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蜀汉的军事行动呢?据史料,诸葛亮及蒋琬在建兴二年(224年)、建兴五年(227年)、建兴十年(232年)、延熙元年(238年)分别在汉中实施屯田^①,应该是为下一年的南征和北伐进行准备工作^②。相反在史料中也可散见“无准备期北伐”的例子,这些可以解释为原本打算掠夺敌地(陈仓等)的粮食并在敌国(五丈原等)屯田^③。这种“无准备期北伐”多见于姜维时期,如后所述,这可能是因为姜维只掌握军队而未能掌握朝廷大权,加之特别优先考虑与孙吴和曹魏国内的反叛势力及周边异族建立战术合作的结果。姜维曾呼应诸葛亮和治无戴之乱进行北伐,当他们失败后则因粮食短缺而撤出^④,便是很好的例子。

北伐的季节特点也反衬出北伐与屯田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前所述,诸葛亮的军队是自给自足的组织,只要在上年度对军粮准备期进行合理的安排,理论上就可以在来年的任何一个时期出兵。反过来说,如果诸葛亮打算在占领地屯田,则需要在春季的播种期前出兵。实际上,诸葛亮在五丈原屯田之际,于春二月出汉中^⑤。而陈仓包围战的目标则是夺取陈仓的粮食,因此从冬季即开始实施包围。相较而言,第一次北伐虽然在春季出兵,诸葛亮却没有在敌地实施屯田的计划,这意味着蜀汉会失去汉中本年度的屯田收获。但如前所述,由于上一年蜀汉已经完成了军粮方面的准备,所以不会有问题。但曹魏方面则由于诸葛亮的进攻,所以不得不被迫中断农作应战,其财政由于这期间无法在城外等地进行播种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当的损失。可以说,诸葛亮在远征时甚至考虑到了曹魏方面的军粮问题。虽然史料中没有就这一战术意图做明确记载,但只有这样解释才可以对蜀汉的军事远征及其季节特点之间的关系说得通。

蜀汉虽然建立了如此严格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却依然出现了财政短缺,故很可能对民间经济课以较重的赋税。如后所述,诸葛亮通过实施严格的法制统治、思想统制及非常合理地运用军队以极力减少民的不满^⑥,同时利用军队对国内的基础设施等进行完善。

○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此非急务,何也?”袁子曰:“小国贤才少,故欲其尊严也。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

华,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⑦

这些事业严格讲是以征税对象的水田旱田划分、官厅等统治机构、进军用的公路等为对象,原本是为了完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但这在另一方面也为民间带来了利益。于是诸葛亮利用严格的统制和合理的人员配置,将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队用于完善国内基础设施。

总之,手握重权的诸葛亮把经济与军事两者加以结合,在打倒曹魏的大旗下实现了国内大团结的局面,同时通过持续制造战争,绑架周边居民将蜀汉国内的不满引向魏,从而巧妙地继续维持国家权力。诸葛亮自己从来没有放弃对军事胜利的希望,即使在不能指望大胜时,也会根据情况对战略做部分调整,通过夺取部分曹魏领土、绑架曹魏的民及周边蛮族使之迁徙至汉中等手段激发国内的斗志。甚至姜维还令周边居民进行屯田以维持军粮,对周边居民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要而言之,这种远征、对外国人绑架、屯田三位一体的活动在增强兵力、镇抚周边、彰显国威等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对于军事最优先型经

① 《后主传》,第894~895页;《诸葛亮传》,第919页;《赵云传》,第949页;《后主传》,第896~897页;《蒋琬传》,第1058页;《姜维传》,第1064页等。

② 〔日〕满田刚《蜀汉・蒋琬政权的「北伐」について(关于蜀汉蒋琬政权的「北伐」)》(《创价大学人文论集》2006年第18号)认为费祎和姜维的专权要弱于诸葛亮和蒋琬,费祎虽然对北伐很消极,但姜维不顾内政断然发动军事行动。费祎其实有足够的军权来限制姜维进行北伐的规模,因此,不能说费祎无法控制姜维。费祎允许姜维北伐,是因为有限度的北伐不会引起军粮的问题,损失也不那么巨大,且如果取得了胜利能达到宣扬国家的威力的效果。而且,据《三少帝纪》,“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谋豎柁,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第126页),费祎似乎在延熙十四年前后准备大规模的北伐。如本稿所说,姜维也重视跟孙吴等进行战略性联合及在敌国内进行屯田与掠夺,所以他不一定没有计划。关于“不顾内政”这一点,既然“内政=老百姓的生活”,也可以将诸葛亮、蒋琬认为是不顾内政,因为他们均采用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③ 《诸葛亮传》,第924~925页等。

④ 《姜维传》,第1064~1067页等。

⑤ 《后主传》,第896页;《诸葛亮传》,第925页等。

⑥ 《诸葛亮传》注引《默记》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第935页)

⑦ 《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第935页。

济体系来说也是必要的措施^①。

五 蜀汉末期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与其变化

接连实施的军事行动在失去诸葛亮这一精神支柱后遂陷入了僵局。虽然这一重大的社会转变不应该仅仅归因于诸葛亮个人的才能,但是他出色的统率力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使十万人长期归属于军队无疑会令其家人提心吊胆,而且北伐造成的伤亡也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民的反感,即使如此,蜀汉政权仍然得以确保相对的稳定。这显示了有志于北伐的诸葛亮所实施的经济政策面面俱到,也从侧面向我们传达了他对思想方面的统制方法是何等的卓越^②。传世文献中可以散见显示这一事实的史料。

P.【诸葛亮】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③。

而且陈寿在向西晋王朝呈上基于诸葛亮的语录而撰的《诸葛亮集》时,引用了《孟子·尽心上》的一句话作为评价。

Q. 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④。

这表明由于诸葛亮在严格立法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利用民力,且高举“汉室复兴”这一大义名分,所以民间不存在抱怨者。当然这只是统治者单方面的说法,在事实上不可能全民都对诸葛亮的治政没有不满。然而对于诸葛亮高超的治政能力,连父亲被诸葛亮处罚的陈寿都对他敬爱有加,整个《三国志·蜀书》都充满了对诸葛亮治政能力的赞美之辞,从中也可管窥一斑^⑤。在诸葛亮死于五丈原后,严格的思想统制发生了动摇,不仅北伐,就连维持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都变得举步维艰。据传在成都,诸葛亮死后纷纷出现有逃兵现象^⑥。毋庸赘言,除了诸葛亮外,魏延和杨仪等重臣的陆续死亡也加剧了蜀汉统治体系的动摇。

诸葛亮能够拥有绝对权力的背景还有一点,是他一方面管辖政治和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将所谓政治和军队分而治之,能够获准同时全权掌握这两个领域。亦即诸葛亮自从在刘备政权下成为“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⑦以来,便已掌握了蜀汉的大权。“录尚书事”是习惯性表述^⑧,在蜀汉是“总统国事”的角色。顺便要说的是,即使是在失守街亭,诸葛亮自己提出降格成为“右将军”后,他仍然同时掌握着军事权力(右将军府)和政

治权力(录尚书事),其后他又恢复了丞相、录尚书事。所以诸葛亮具有专断经济与军事之间政治性联动的大权。

相比之下,蒋琬和费祎并没有就任丞相,都只是兼任大将军和录尚书事。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放弃政治与军事权力。诸葛亮死后,失去了位居“将军系”和“尚书系”之上的丞相,再加上蒋琬曾任抚军将军、尚书郎等,而费祎则作为中护军、尚书令等,两人都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同时就任大将军和录尚书事并没有较大的阻碍(史料 R、S)。不过,有人提出蜀汉从诸葛亮之死到蒋琬成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之间存在蒋琬、费祎、杨仪、邓芝、姜维、张翼合作的所谓“集团指导体制”^⑨。其证据如下:

R. 于是以【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以【杨】仪为中军师、司马费祎为后军师、征西姜维为右监军、辅汉将军,邓芝前军师、领兖州刺史,张翼前领军、并典军政^⑩。

可是严格来说,上述史料仅仅表示由如上 6 人共

① 孙吴也常常绑架山越,关于其目的存在多种见解。比如,为了增强军备(获得劳动力)、为了开发江南、为了加强豪族势力。唐长寿:《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版;〔日〕川胜义雄:《孙吴政权与江南的开发领主制(孙吴政权与江南的开发领主制)》,《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 1982 年版;〔日〕大川富士夫:《吴的四姓について(关于吴的四姓)》,《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东京,雄山阁 1987 年版等。

② 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

③ 《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第 934 页。

④ 《诸葛亮传》,第 931 页。

⑤ 〔日〕井波律子:《解说——陈寿的「仕挂け」(解说——陈寿的「手法」)》,井波律子译注:《正史三国志·蜀书》,筑摩书房 1993 年版等。

⑥ 《吕义传》,第 988 页。

⑦ 《诸葛亮传》,第 917 页。

⑧ 〔日〕镰田重雄:《汉代的尚书官——领尚书事と录尚书事を中心として(汉代的尚书官——以领尚书事和录尚书事为中心)》,京都《东洋史研究》1968 年第 26 卷第 4 号。

⑨ 〔日〕石井仁:《诸葛亮·北伐军团的组织与编成について(诸葛亮·北伐军团的组织与构成)》,仙台《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1990 年第 4 号。〔日〕满田刚:《诸葛亮没后的「集团指导体制」と蒋琬政权(诸葛亮死后的「集体领导体制」和蒋琬政权)》,东京《创价大学人文论集》2005 年第 17 号。

⑩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后主志》建兴十二年条,第 399 页。

同控制“军政(=军事行政)”而已,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共同地控制“国事(=国政的一切)”。实际上,只有蒋琬作为尚书令控制了人事,而且其他5个人负责“军政”也是出自蒋琬的安排,所以史料R说蒋琬“总统国事”,由此可见蒋琬就任尚书令后对国政的大权总揽。蜀汉的尚书令不只是一官之长,而且跟录尚书事一样拥有很大的权力。费祎跟蒋琬一样,其于延熙七年(244年)取代蒋琬成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后即开始专断国政^①。

在费祎死后董允担任尚书令,他虽然曾当过将军系的官却没有实战经验,而且费祎死后不久他也很快死亡。作为其后继人的吕乂也死于延熙十四年(251年)。因此在这以后由实战经验丰富的姜维率领军队进行对外战争,对内则是侍中守尚书令、镇军将军陈祗掌握朝廷大权。虽然姜维在延熙十年(247年)与费祎一起成为录尚书事^②,但他所行之事只是对外征伐。而且姜维在延熙十九年(256年)作为大将军断然实施北伐被曹魏的邓艾大破后被降格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这段时间的史料中没有其与录尚书事相关的记载,因此,此时的姜维很可能已经不再担任录尚书事。实际上,《费祎传》云:

S. 自琬及祗,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

这意味着蒋琬与费祎在外地参与所有的赏赐和刑罚,反而费祎以后没有那么有权力的人。且《陈祗传》表示大将军姜维虽然席次上位于陈祗之上,他却没有“朝政”的实权,陈祗比姜维颇受器重:

T.【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

众所周知,蜀汉的尚书拥有很大权力^③,且应该能够通过掌握人事与户籍管理内政^④,所以不担任录尚书事的姜维其身份只是纯粹的军人。另一方面,陈祗过去未曾率领过军队,镇军将军的职位也不过是其就任侍中守尚书令的同时授予的名义上的职位,这反映陈祗和姜维的升迁之路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这时的蜀汉已经没有人能够同时对政治和军队进行掌控。

但此时的军队和政治也并没有产生分裂。一方面是由于姜维不断地对外征战没有时间住在成都,尚书令陈祗掌握成都的实权,估计在军

队和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另一方面,这是由于屡次的对外用兵产生巨量支出,其经济负担会直接压向尚书令陈祗,但陈祗仍然继续支持姜维^⑤,这应该也会有助于缓和军队和政治之间的对立。

姜维其后反复北伐,败仗逐渐增多,最后甚至遭到了同属于军队的征西大将军张翼的反对^⑥,这是姜维的失策。如前所述,诸葛亮、蒋琬、费祎虽然同样维持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但他们从来没有轻视录尚书事的工作,也没有接连遭遇大的军事败仗。与之相对,姜维本来就缺乏对尚书的影响力,并且在北伐中连战连败。自景耀元年(258年)以来,蜀汉的朝廷已经被宦官黄皓所垄断^⑦。这是在董允死后陈祗开始管理尚书的工作时,由于陈祗给了黄皓高位官职发生

① [日]满田刚《蜀汉·蒋琬政权の「北伐」について(关于蜀汉蒋琬政权的“北伐”)》认为费祎的专权无法和诸葛亮与蒋琬相提并论,他主要举出三个理由。第一,费祎跟姜维一起就任录尚书事。第二,《魏略》中提到在蒋琬死后刘禅开始亲自执政。第三,费祎自蒋琬死后6年(延熙十五年、252年)才开府。但是,关于第一,如本稿所述,我们不能确定姜维一直行使了录尚书事的权力。第二,《魏略》是在曹魏写的史料,不一定正确地说明蜀汉国内的真实情况。第三,蒋琬也是自诸葛亮死后过了4年(自杨仪解职过了3年后)才开府,并非在掌握国政后立即开府的。所以笔者认为,据史料S与《费祎传》,“延熙七年……【蒋】琬让州职,【费】祎复领益州刺史。祗当国功名,略与琬比。十一年,出住汉中。自琬及祗,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第1061~1062页),费祎就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时(延熙七年、244年),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执政者,并在汉中出兵时(延熙十一年、248年)掌握国政。

② 《姜维传》,第1064页。

③ 关于蜀汉的尚书,自[日]狩野直禄《蜀汉国前史》,东京《东方学》1958年第16辑;《蜀汉政权的构造》,京都《史林》1959年第42卷第4号)等以来出现了诸多研究,但以往的学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到与尚书相关联的官吏的故乡上,因为他们认为蜀汉政府内派系是基于故乡形成的。这种观点很有价值,但跟本稿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关于蜀汉的尚书的相关史料,参见黄惠贤、王奎:《蜀汉中央的政治制度》,《三国政治制度剖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 尚书郎李虎在蜀汉灭亡时向曹魏提出了《士民簿》,据此可见尚书台在蜀汉也负责户籍的管理。

⑤ 《谯周传》,第1029页。

⑥ 《张翼传》,第1075页。

⑦ 《后主传》,第899页。

的变化^①。这也从侧面表明掌握尚书的人拥有操纵官职的权力。黄皓后来在君主刘禅处逐渐拥有了影响力,他获得尚书令陈祗的许可开始逐步独揽朝廷大权。从这一时刻起,除了军队与政治势力以外,新的宦官势力开始兴起。到了景耀四年(261年),诸葛瞻和董厥新任“平尚书事”,尚书令樊建、诸葛瞻、董厥合作“统领事务”^②,但均未能封杀宦官势力。

而且当时在成都,反对北伐派黄皓、右大将军阎宇、诸葛瞻结盟,有取代在北伐中接连战败的姜维推举阎宇从而掌握军队之势^③。如前所述,当时的蜀军中已有如张翼这样的反对北伐派,这些人也有可能倒向阎宇,这反映了军队内部的分裂可能。另一方面,为了打压宦官势力也导致了宦官黄皓与尚书系的诸葛瞻等之间的对立^④。也就是说,过去在尚书领导下团结一致的朝廷在此分裂为“宦官系”和“尚书系”。因此在蜀汉末期的朝廷中,“姜维系军队”、“阎宇系军队”、“尚书系”、“宦官系”四大势力激烈交错,整体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在旁虎视眈眈的曹魏自然不会错失这一空隙。

景耀六年(263年),钟会、邓艾等率军大举进攻蜀汉。分裂为“姜维系军队”、“阎宇系军队”、“尚书系”、“宦官系”四大势力的蜀汉被敌人所突破。其时的姜维不敢与阎宇系军队、尚书系、宦官系正面对决,而是选择在沓中从事屯田,长期未回成都。即在姜维系军队内依旧实施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然而,分裂为姜维系和阎宇系的军队也使得姜维不能充分发挥其实力以致在前线遭遇败仗。姜维虽提前向成都提出求援,但由于宦官系等的阻挠使得救援大幅推迟^⑤。最终姜维决定退至剑阁,在这里阻挡曹魏的主力。此时的蜀汉军队为了抵御外敌再一次团结在姜维的周围,恢复了本来的实力。张翼和廖化等诸将军带领援军纷至,尚书系的董厥也前往支援姜维军,且剑阁背后还有同属尚书系的诸葛瞻,在这种情况下曹魏军不得已只有撤退^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处于四分五裂的蜀汉政权仍有以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为基础的潜力,虽然蜀汉最后由于邓艾的奇袭战被灭亡,但就这个问题而言,仅从《三国志·蜀书》中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邓艾个人功绩的作用,未必说明蜀汉本身在结构性上具有某种失败因素。如前所述,虽然蜀汉当时内部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且屡次北伐

导致民疲,但是军队的分裂问题在剑阁撤退时已得到解决,而且蜀汉的主力在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下仍然有足够的兵力和辎重。

六 结 语

以上本稿论述了蜀汉政权自始至终所贯彻实施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其中,布帛发挥了主要国家性结算手段的作用,钱则具有民间经济流通手段的作用,两者分别作为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的润滑油流通。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的基础是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分别同时拥有统治经济和军事的大权,该体系在尚书令陈祗死后开始发生动摇。所谓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是拥有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左右吏卒的蜀汉,通过对这些吏卒的合理调配利用,以计划性军事都市汉中为据点开展远征、绑架、屯田三位一体的活动的体系。通过该体系的实施得以实现增强兵力、镇抚周边、显扬国威的效果。蜀汉之所以采用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其原因是在曹魏的压力下产生的,是一种战时的经济体系,这就是蜀汉经济的结构特点。

这种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是迫于实力强大的曹魏而不得不实施的一种政策,其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维护民间社会的稳定,而是以临战体系编制为基础的过渡性经济体系。虽然蜀汉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但其实施的这种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仍给老百姓增添了较大负担,因此需要经济与军事之间的政治性联系并以此圆滑地经营该经济体系。虽然该经济体系自尚书令陈祗死后逐步产生动摇,但在此后,蜀汉的最后一段时期尚书系与将军系的联系得以重新恢复,由此可见蜀汉政府还有余力。最后,魏将邓艾回避蜀汉的主力而沿近道对成都发动奇袭导致蜀汉的

① 关于蜀汉尚书具有的人事权,《杨仪传》曰,“先主称尊号,东征吴,【杨】仪与尚书令刘巴不睦,左迁遥署弘农太守”、“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杨】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第1004、1005页)。

② 《诸葛亮传》附《董厥传》,第933页。

③ 《姜维传》,第1065页。

④ 《诸葛亮传》附《诸葛瞻传》注引《华阳国志》曰:“【诸葛】尚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乃驰赴魏军而死。”(第932页)

⑤ 《姜维传》,第1065~1066页。

⑥ 《姜维传》,第1066页;《邓艾传》注引《袁子》,第781页。

灭亡。

如上述经济统计来看,蜀汉的刘备和诸葛亮采取了对民严酷的政治体系,然而为什么他们在历史上仍长时间受到赞美呢?对此有很多不同见解。至于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从西晋时代开始受到褒扬,其原因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在《三国志》等书中可散见对诸葛亮、蒋琬、费祎等的赞美,同代的人似乎也很仰慕他们,这看上去似乎与笔者对蜀汉经济的观点相抵触。但实际上,现存史料说到底不过是名士层的说法,并不属于来自民间的评价。另外,对于蜀汉的人们来说,建立蜀汉全盛期的诸葛亮等人是他们的荣耀,特别是诸葛亮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完成庞大的工作量,提出经得住考验的大义名分,最后乃至过劳死,如史料 P、Q 所示,民中可能也有人自愿主动服从诸葛亮。另一方面,对于征服巴蜀后接受曹魏的禅让并且在外部还要面对孙吴这一强敌的西晋而言,赞美诸葛亮等人对于巴蜀地区的稳定

具有重要作用^①。这一政策不仅可以安抚被征服地巴蜀的人心,表明西晋的度量,还对劝降孙吴具有积极作用^②。而且建立了西晋建国基础的司马懿是阻挡诸葛亮的曹魏的功臣,赞美诸葛亮也有助于彰显司马懿的军功。因此,赞美诸葛亮等人的言论才在蜀汉亡后扎根。

收稿日期 2011—05—03

作者 柿沼阳平,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助教。东京,1510053。

【责任编辑 叶子玉】

① [日]渡边义浩:《陈寿の『三国志』と蜀学(陈寿的〈三国志〉与蜀学)》,《西晋「儒教国家」と贵族制(西晋“儒教国家”和贵族制)》,东京,汲古书院 2010 年版,第 349~375 页。

② 关于西晋时期对诸葛亮评价,参见[日]狩野直禎:《西晋时代の诸葛孔明像(西晋时代的诸葛孔明像)》,京都《史林》1976 年第 59 卷第 1 号。